

台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

——以六〇到八〇年代為探討中心

侯作珍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海外文學是六〇年代以降的台灣知識份子特定的時代環境下出國留學和移民所創作的作品。由於身處異國文化的環境，心中又懷抱著無法割捨的祖國想像與情感，海外文學常出現擺盪在祖國和居留國兩種文化之間難以調適的困惑，而產生了身分認同的迷惘，形成無根與放逐的「流浪的中國人」的創作主題，這一代知識份子也成為「無根的一代」，在異國放逐不歸；身分的追尋與認同迷惘的消解過程，是他們開啓的離散書寫中最引人注目的經歷。

本文將觀察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海外文學（以小說為主）的離散書寫，是如何從解決認同迷惘的困境來展開身分的追尋？離散主體認同迷惘的消解，就是身分重新定位的契機，從這個過程中可發現，離散主體從早期漂泊離亂的時代受害者，漸漸轉變為中西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的批判者，由懷想祖國、回歸後的幻滅到不寄希望於祖國和居留國，在兩者間以客觀的角度建立存在主義式的批判性離散認同，從而創造離散主體的特殊價值性與批判性的離散文化，當是台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最大的意義所在。

關鍵字：離散、放逐、身分認同、存在主義、海外小說

一、放逐·離散·流浪的中國人與「無根的一代」

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在全球化與後殖民和後現代的理論背景下受到了學界的關注，當放逐、移民和跨國遷徙已成為二十世紀後期的普遍狀態，海外華文文學中所描寫的海外華人的離散（diaspora，或譯「族裔散居」）內容便格外值得探討；現代人自覺或被迫遠離家國與土地，展開無根和漂泊的行旅，其間產生的命運懸置感與身分認同的追尋，可視為一種離散的現代性經驗，本文便從這樣的思考角度出發，探討六〇到八〇年代台灣海外文學中離散主體身分認同追尋的模式與過程，並從中闡明離散書寫的演變及價值。

六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被無根與放逐的概念所籠罩，同時也是離散書寫的起點。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國共兩岸分治的大陸移民潮和留學風氣的影響。在國際冷戰結構中，台灣孤懸、狹小及落後的國際地位與政經格局在美援文化的激盪下，促成了留美和移民的時代熱潮¹，留學生身為高級知識份子而去國或移民，在海外創作大量的文學，反映了擺盪在祖國和居留國之間「流浪的中國人」的文化衝突和身分認同的迷惘，成為「無根的一代」的文學。白先勇曾以「放逐」來概括年輕知識份子流亡海外、自甘放逐的處境，並指出中國的流放者不同於西方「失落的一代」和「憤怒的年輕人」要徹底推翻自己本有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流放者被逐出樂土伊甸園，失去了繼承權，變成一無所有的精神上的孤兒，因此竭力尋找失樂園，希望重獲那給奪去了的中國文化遺產²，「放逐」自此成為概括六〇年代海外文學的基本母題，是較為廣義的用法。

若採嚴格的定義，放逐（exile）多半出於政治迫害之下的自願與非自願性流亡，個體在被迫的狀況下遠離故土，形成對故土和祖國政權的批判和抵抗，並將個人理想寄託於另一處烏托邦，例如在納粹政權和共產政權迫害下逃亡的作家所創作的放逐文學，已成為二十世紀文學的普遍現象。相較於西方的放逐者大多唾棄祖國的政權，中國的放逐者（一九四九以後台灣的大陸移民潮與六〇年代的留學潮）則悲悼自己的命運³，沉浸在故土之思與失樂園的美化追逐上，從而產生與現實脫節的精神狀態；一九八九大陸六四事件之後放逐海外的作家才又接續了西方放逐文學的精神。

晚近的學者主張應以「離散」的概念取代放逐來看待六〇年代的海外文學，例如范銘如便認為放逐含有被迫離開與尋找烏托邦的意義，一旦被迫的情況解除，可以返國卻選擇留下不歸，就從放逐變成離散的狀態；放逐者希冀未來與某地，離散者卻緬懷過去和故鄉。六、七〇年代的留學生不是被迫去國，在要留要去之間有自主權，加上作品中的思鄉尋根愁緒瀰漫，較符合離散的詮釋概念⁴。

¹ 對六〇年代台灣留學生小說產生之社會背景的說明，可進一步參考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台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台北：萬卷樓，2001）。

² 見白先勇〈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說的放逐主題〉，收入《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

³ 見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2003），頁8。

⁴ 見范銘如〈來來來，去去去：六、七〇年代海外女性小說〉，她贊成 Amy K.Kaminsky 以嚴格

林鎮山也用離散概念解讀白先勇和保真的小說，著重剖析小說中的離散人士「擁抱著不只一個以上的歷史、一個以上的時空、以及一個以上的過去與現在，還歸屬於此間與他地，又背負著遠離原鄉與社會的痛苦，成為異地的圈外人，而淹沒在無法克服的記憶裡，苦嚙失去與別離」的糾結情感⁵。離散本來指四散分離的猶太族群基於其共有的經驗在文化及宗教上持續的連結，現在則被擴大用來指稱那些跨越國境的移民或離居者在文化上（類似於猶太裔）的聯繫或溯源⁶，因此可泛指移居國外的族群經驗。離散主體對祖國懷有深刻的記憶與想像，支持祖國並渴望回鄉，常與居留國有格格不入的疏離感，而產生在過去／現在、他處／此處的身分認同（identity）⁷的搖擺。以此定義來檢視六〇年代海外文學，確有其合理之處，故土之思與身分認同的迷惘確實是這些文學作品中揮之不去的陰霾，離散書寫也因此充滿失根徬徨的苦悶與哀傷。

但若從積極的層面來看，離散主體的跨國界與至少二重以上的文化體驗，雖造成身分認同的錯亂，也未嘗不能在差異性中有所反思與創造。霍爾（Stuart Hall）認為離散族裔的認同不是固定的，它永不完結，且永遠處於過程之中，必須經由差異與混種性來定義⁸；安恩（Ien Ang）也認為離散族裔應利用處於客鄉與原鄉之間複雜而富彈性的地位，不偏袒居留國或（真實抑想像的）祖國，在兩者之間保持創造性的張力，建立批判性的離散文化⁹。

本文將觀察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海外文學（以小說為主）的離散書寫，是如何從解決認同迷惘的困境來展開身分的追尋？離散主體認同迷惘的消解，就是身分重新定位的契機，從這個過程中可發現，離散主體從早期漂泊離亂的時代受害者，漸漸轉變為中西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的批判者，由懷想祖國、回歸後的幻滅到不寄希望於祖國和居留國，在兩者間以客觀的角度建立存在主義式的批判性離散認同，從而創造離散主體的特殊價值性與批判性的離散文化，當是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最大的意義所在。

的定義區別放逐與離散的用法，收入《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

⁵ 此段離散狀態的界定是林鎮山援用 John Docker 的說法，見林鎮山〈瓢萍與斷蓬：白先勇和保真的離散書寫〉，收入《離散·家國·敘述》，（台北：前衛，2006），頁 113。

⁶ 孟樊引 Gilroy 對離散的界定，見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2001），頁 133-134。

⁷ identity 一詞常見的翻譯有「認同」、「身分」、「屬性」等等，這些翻譯都各自傳達出原文的部分涵義，在不同的語境裡有不同的翻譯；台港學術界多譯為「認同」，但為避免「身分」等意義的流失，故本文在不同語境中以「身分」和「認同」交替使用，並以「身分認同」來表示「身分來自認同、而認同的結果也即身分的確定」之意涵。可參考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頁 16-17。離散主體的身分認同往往受到「我是誰？」「從哪裡來？」「身居何處？」的交互影響而不斷改變；本文所使用的身分認同主要是指在最基本的層面上被密切的結合在一起的諸如國族、種族、族群、文化等等的認同。

⁸ 可參考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⁹ 見 Ien Ang 作，施以明譯〈不會說中國話：論散居族裔之身分認同與後現代之種族性〉，《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7 期，1992），頁 63。

二、 離散主體的身分追尋與認同迷惘的消解

六〇年代以降漫長的二三十年歲月中，描寫關於「流浪的中國人」的命運一直是台灣海外小說創作的重要題旨¹⁰，小說中去國不歸的留學生和移民，雖然身居異地，卻始終心念中國，無法融入當地的生活，成為異地的邊緣人。他們心中懷想的中國因兩岸政治分裂回不去，而台灣也不是一個理想的歸屬，空自懷抱對中國文化和原鄉的回憶，產生無家可歸的流浪感受，這種找不到身分認同的迷惘，使小說中的離散主體展開了身分認同的追尋，試圖以各種途徑消解認同迷惘的困境，以便尋找身分的定位。基本上有四種途徑：

(一) 死亡幻想·放縱·瘋狂·我即中國

白先勇《紐約客》系列的小說人物，背負著濃厚的家國情感與原鄉記憶，在面臨身分認同的迷惘時，常見以死亡幻想或自我放縱來了結餘生，最具代表性的如〈芝加哥之死〉的吳漢魂和〈謫仙怨〉的黃鳳儀。吳漢魂在美國拿到文學博士的第二天，反而感到無家可歸：

他不要回去。他太疲倦了，他要找一個隱密的所在，閉上眼睛，忘記過去、現在、將來，沉沉的睡下去。地球表面，他竟難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腳。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沒有二十層樓的大廈，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二十層公寓的地下室去。…芝加哥是個埃及的古墓，把幾百萬活人和死人都關閉在內，一同消蝕，一同腐爛¹¹。

可見台北和美國都不是他認同的所在，他徘徊在密歇根湖畔而產生死亡幻想，以此消解認同的苦悶。〈謫仙怨〉的黃鳳儀到紐約讀書，決心拋棄從前的回憶，輟學到酒館賺錢，過著和男人調情的放浪生活。她寫信給母親說：「淹沒在這個成千萬人的大城中，我覺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種獨來獨往、無人理會的自由。…在紐約的最大好處，便是漸漸忘卻了自己的身分，真的我已經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紐約客了。」最後還附註：「以後不必再寄中國罐頭來給我，我已經不做中國飯了，太麻煩。」¹²黃鳳儀的選擇是遺忘中國的身分和飲食文化，做個享受當下、沒有歷史記憶的紐約客，以放縱自己來麻痺痛苦。

叢甦的〈自由人〉、〈野宴〉和〈中國人〉都在描寫身處美國的中國人既融入

¹⁰ 例如保真在《邢家大少》自序中就曾說：「過去四年，我一直在寫『流浪的中國人』為主題的系列小說...這樣一個題材，我無法置身事外...『流浪的中國人』不僅是小說的題材，實在也是我個人內心懸而未解的困惑：為什麼我們會流浪？...這本小說是旅人的夢，因為我們都曾幻想流浪的日子不過是夢罷了，夢醒時原來都在家裡。但這樣的幻想，豈不才是真正的夢嗎？」很能夠代表海外作家創作此題材的動機與心緒狀態。見《邢家大少》，（台北：九歌，1984），頁3-4。

¹¹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收入《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2003），頁247。

¹² 白先勇〈謫仙怨〉，收入《寂寞的十七歲》，頁321、323。

不了美國社會，又找不到出路的徬徨與失落。〈自由人〉中的主角自由人（Freeman，音譯費孟）原名古言泉，是一個生活在紐約的沒有根的中國人，他想擺脫中國人的身分做個世界人卻做不到，空有一腔理想，被左派革命組織吸收和利用，最後精神失常而進了病院。他說：「像我這樣不完整的人，在這裡的中國人裡面有很多，…中國人在一個異族的社會裡，老是有格格不入的感覺，永遠沒有真實感，也永遠沒有紮紮實實生根的感覺。一晃眼就是大半輩子過了，到死了還念念不忘家鄉的一棵樹，一塊石頭。多少人到了頭髮灰白還不能真正打入這社會，不能完全接受這個社會，也不能完全被接受，就在這麼不上不下、不前不後、半死半活的狀態中拖日子。」¹³這段話說明了離散主體以「從哪裡來」的記憶壓倒「身居何處」的事實，從對想像中的祖國的認同，得到（替代性的）歸屬感，卻往往是在居留地被邊緣化的一種徵兆¹⁴。因此在〈野宴〉中，一群留學美國和在美工作的中國人去郊遊野宴，談起中國人在美國社會的感受是：

在這個社會裡，我們只不過是夾縫裡的人，是的，夾縫人，邊緣人…生活在別人的屋簷底下，屋簷雖好，終究是別人的，也好像是生活在大岩石夾縫裡的小草，遮風避雨，但是假如有一天大石頭倒了，我們也不存在了…我們的命運不在自己手裡…¹⁵。

這種離了祖國又難入居留國的夾縫邊緣之感，使離散主體的身分認同充滿了迷惘與失落。〈中國人〉的文超峰學的是歷史，在西方工業社會中有所學非主流的寂寞，加上身為中國人的無家感，他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充其量是邊緣的，自己是歷史、文化、時代、政治夾縫中求生存的異鄉人，但最後他受到啓發，領悟到「中國是一種精神，一種默契，中國就在你我的心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是中國，有說中國話的地方就是中國，中國是億萬中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冀和嚮往…」¹⁶此處離散主體對祖國的認同已經不侷限在家鄉的懷想或對中國的美化上，而是把理想價值的追求內化到中國精神的體現上，試圖由自己身上建立「我即中國」不假外求的中國意象，暫時不受身分認同問題的困擾。

（二） 淡化或拋棄中國人的身分

另外一種試圖擺脫身分認同困擾的方式是淡化或拋棄中國人的身分，完全認同美國身分和美國社會，如叢甦〈野宴〉中的林堯成是歸化美國的電腦博士，觀念和作風都很美國化，他批評中國人的畫地自限：

中國人一天到晚自怨自艾，說美國社會不接受。其實自己根本不想被同化，

¹³ 叢甦〈自由人〉，收入《中國人》，（台北：時報文化，1978），頁73-74。

¹⁴ 見 Ien Ang〈不會說中國話：論散居族裔之身分認同與後現代之種族性〉，頁62。

¹⁵ 叢甦〈野宴〉，收入《中國人》，頁145。

¹⁶ 叢甦〈中國人〉，收入《中國人》，頁240。

怎麼能怪別人歧視？就說我們吧，一大夥中國人在一起一天到晚吱吱喳喳的，人家當然聽了就煩…我認為這是一種心理上的障礙，情感上的包袱，要是中國人不先把這個扔掉，一萬年也休想打入美國社會！¹⁷

林堯成沒有背負對中國感情上的包袱，所學也是熱門的電腦，因此非常適應在美國的生活。白先勇〈安樂鄉的一日〉中的偉成和寶莉也是融入美國生活的中國人，華裔美籍的寶莉受美國教育，被同學叫 Chinaman 以及母親灌輸她中國認同時，大叫：「我是美國人」、「我不是中國人！」¹⁸身為中國移民第二代的寶莉已完全拋棄中國的身分認同。保真的〈邢家大少〉描寫一群從五歲到十幾歲就移民或留美的中國學生對中國身分的認同程度，年紀愈小跟隨父母來美者，中國的包袱就愈輕，例如邢家大少「麥克邢」五歲來美，在美國受教育成長，不會說中文，和美國同學以流利的英語交談：「我們美國人有一句諺語…」¹⁹已完全認同自己是美國人。但是這種淡化或拋棄中國人的身分而認同美國的中國人，往往因其斷根的行爲而變成其他鄉愁深重的中國人批判質疑的對象。

（三） 回歸的希望與幻滅心死

既然鄉愁難遣，離散主體便面臨了回歸與否的問題。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男主角牟天磊，花了十年在美國取得新聞博士，回到台灣，想找尋鄉愁的記憶，卻發現台灣已飛快的轉向美國化與現代化，台灣人的觀念、衣著和言行都是崇洋的，在台北飯店的舞廳中他有置身芝加哥舞廳的錯覺。台灣已變得陌生，於是牟天磊說：「在美國十年，既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我不喜歡美國，可是我還要回去。並不是我在這裡不能生活得很好，而是我和這裡也脫了節，在這裡，我也沒有根。」²⁰但是回美國教中文也不是牟天磊的志趣，昔日的師友邱尚峰勸他留在台灣開課辦雜誌，介紹歐美現代文學，替台灣做點有意義的事。牟天磊徘徊在去留之間，幾番轉折；他在花東之旅找回了屬於台灣的淳樸自然的感動，邱尚鋒的意外之死也讓他決定說服崇洋的未婚妻，留在台灣。雖然小說最後並無交代他的說服是否成功，但回歸的意願出現在「無根的一代」的牟天磊身上，是解決身分認同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轉變。尤其是經歷了一九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之後，海外知識份子的愛國心得以凝聚，回歸意識明顯地提升了，可惜保釣運動到最後又變質為左派和右派的鬥爭，失去了原初的意義。

張系國《昨日之怒》便是描寫保釣運動如何凝聚海外知識份子的身分認同，但隨著保釣運動的變質和退燒，當初為理想獻身的知識份子也飽嘗挫敗與幻滅。小說主角葛日新投入保釣運動，放棄了加州大學化學博士的學位，在街頭賣包子維生。保釣運動讓他見識到原本像一盤散沙的海外中國人不分年齡、性別、省籍

¹⁷叢甦〈野宴〉，收入《中國人》，頁 138。

¹⁸白先勇〈安樂鄉的一日〉，收入《寂寞的十七歲》，頁 281。

¹⁹保真〈邢家大少〉，收入《邢家大少》，（台北：九歌，1984），頁 117。

²⁰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台北：皇冠，1981），頁 146。

而團結在一起，爲了崇高的理想放棄小我，然而熱潮退卻後大家又回到個人主義的社會，爲各自的事業或利益而努力。葛日新不願過著他所唾棄的功利美式生活：

他不願意在美國找事。也許他應該回台灣去？畢竟那是他生長的地方。可是他還能夠適應國內的環境嗎？他知道，他的政治理想，他過去活動的記錄，都對他極端不利。他愛那片土地，他無時無刻不夢想回去。只有在那片土地上，他能一展所長，他才能問心無愧的生活。他唯一熱愛的是台灣，他唯一所關懷的就是那片土地。爲了她，他可以放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²¹

保釣運動喚起海外知識份子對中國身分的向心力以及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回歸台灣的意願比六〇年代強烈許多；雖然葛日新最後在美國車禍身亡，似乎暗示著政治理想的虛幻以及對個人無情的毀滅，但小說也藉由另一個主角施平回台灣的觀察，播下一些希望的種子。施平在紐約的中文報館上班，憂心中文報紙未來會喪失讀者，因爲華埠新一代長成後不會再關心中國文化，對中國也不會懷抱如老一輩的深厚感情。他對工作使不上力，對保釣運動的退潮亦感失望，在一次回台灣的機會中卻有了新的體悟：「他太遲才發現國內出現了許多新的雜誌，不少年輕人默默在耕耘著，許多新的東西慢慢在成形。一股本土文化的力量漸漸在成長，這裡、那裡，到處都冒出幾顆幼苗。這種新的傾向是施平在國外所不曾留意到的。他因此感到無比興奮，買了一大堆書刊準備帶回紐約去詳細閱讀。國內知識界並不如他所想像的古井無波。他開始明白，保釣運動時種下的幼芽在海外雖已枯萎，在國內卻艱辛的慢慢茁長。這麼說來，一切並未絕望。也許他灰心失望得太早了些？也許並不必妥協，他仍可回來做一些事情？他看出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做，只愁沒有人做。自己的國家絕對需要他。」²²保釣運動刺激了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發展，使得海外知識份子對民族未來努力的方向重新找到了寄託。

相對於某些知識份子在保釣運動之後燃起的回歸台灣的希望，另一群回歸大陸的知識份子卻得到幻滅心死、終至以美國爲安身立命之地的絕望。白先勇〈夜曲〉中描寫抗日勝利後留美的幾個年輕學生，個個懷抱理想，學成後要回大陸爲祖國貢獻所長：吳振鐸要行醫救中國人、呂芳要用音樂安慰中國人的心靈、高宗漢要替中國造鐵路、劉偉要替中國製造化學肥料。結果吳振鐸因故留在美國，事業有成；回國後的呂、高、劉三人卻在文革時期受盡折磨，皆未完成當初報國的心願。二十五年後呂芳再度回到美國與吳振鐸重逢，吳振鐸向她懺悔：「我現在是有名的心臟科醫生了，可是我一個中國人也沒有醫過，一個也沒有——」呂芳淡淡的笑道：「中國人的病，恐怕你也醫不好呢。」一句話道盡了荒謬的政治運動戕害無辜人民的慘痛心聲。呂芳最後和吳振鐸告別時的說話，充滿了對中國的失望與心死：「我現在生活很滿足，真的很滿足，我在裡頭多年夢寐以求的願望，

²¹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1979），頁172-173。

²²張系國《昨日之怒》，頁290。

終於達到了：又回到了紐約來。振鐸，我並沒有你想像那樣勇敢，有兩三次，我差點撐不下去了。可是——我怕死在那個地方。看到高宗漢那種下場，在自己的國家裡，死無葬身之地，實在寒透了心。」²³經歷了回歸後的政治現實之幻滅，當初心懷祖國的知識份子業已夢碎，對中國不再存有幻想，甚至希望逃離中國；在異國定居竟然成為夢寐以求的企盼，此時離散主體對中國身分已由認同轉為批判²⁴。

另一個對中國身分從認同轉為批判的例子是保真〈斷蓬〉中的季浩年。季浩年在抗日勝利後到美國讀書和發展，成為名教授，不再回中國。他對和中國有關的事物和話題一律避而不談，引起小說主角——來自台灣的唐姓留學生質疑他對中國漠不關心，沒有扛起國家苦難的重擔。季浩年嘲諷的說：「我不覺得我欠中國一份情，我何必難受呢？…對於那些背負著重擔的人，無論他們到哪裡，都是一個重擔。」因為他領悟到近代中國從軍閥割據開啓的一連串混戰局面，都是人性的自利和好戰所招致，「其實天地何有不仁？天地叫你打仗嗎？」²⁵季浩年認為中國的苦難也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並且質疑中國人自認的優越民族性，更以老華僑偷渡美國的例子指出中國人只能在別人的環境裡才能求生存，留在自己的國家卻沒有出路。他坦言對中國已經完全絕望，因此將當初離開中國時老師所贈的刻有「斷蓬」字樣的獅子圖章轉送給主角，說：「我很佩服你的熱情，但是，孩子，你也許會為你的熱情付出代價，我祝福你能堅持下去。我是一個衰朽的老人，現在要回中國已經太慢。我曾許諾，如果我不要這顆圖章的時候我會送給你，現在正是這時候了。」²⁶

雖然季浩年批判並試圖解脫中國身分，但仍存有血源和文化上的情感，因此對下一代所懷抱的中國憧憬仍予以鼓勵，獅子圖章的傳承代表了中國身分認同的代代延續，然而小說中另一個角色蔡天錫的遭遇似乎又反諷了這種對中國身分認同的執迷。蔡天錫滿懷熱情回台灣貢獻所學，卻因所學冷門無用武之地，被國人追問「你為什麼要回來」，他只好黯然返回美國，有感而發：

其實我們這些所謂的知識份子，回不回國對中國都沒有影響，我們只是中國人的一小部分，人才外流不是中國的悲劇，真正在演悲劇的是我們這些流浪的知識份子，我們多唸了一點書，多增加了一籬筐苦惱…那些一生沒有動過的中國人哪裡有這種煩惱？²⁷

於是我們看到，回歸畢竟也不是解決離散主體身分認同迷惘的靈藥，不論回大陸或台灣、向左轉還是向右轉，都會遇到不同的社會障礙與困境：一個受共產

²³白先勇〈夜曲〉，收入《紐約客》，（台北：爾雅，2007），頁94。

²⁴此處離散主體的中國身分認同應該還包含血源、情感與文化上的認同，但對中國的政權與國家機器暴力則採取批判的態度，因此不願留在中國，亦不再執著於對中國的懷想。

²⁵保真〈斷蓬〉，收入《邢家大少》，頁230。

²⁶保真〈斷蓬〉，頁250。

²⁷保真〈斷蓬〉，頁246。

極權下政治運動的操控，一個受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制約，而逼使離散主體最終仍以美國為安身立命的歸宿。當然美國社會也有它的問題存在，但離散主體在解脫了中國身分認同的優位性之後，不再厚此薄彼，更能夠以客觀持平的態度來面對中國文化和美國文的優劣，對兩種文化在民族性和制度面上做出創造性的批判。

(四) 存在主義式的批判性離散認同

在這些海外小說中，較能夠符合霍爾（Stuart Hall）和安恩（Ien Ang）所說的在居留國和祖國之間保持創造性張力，建立新的身分定位與離散認同者，當屬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與馬森的《夜遊》。這兩部小說都在探討人存在的困境，將中國的離散者和異國的離散族群與邊緣人結合起來，因而跳脫身分認同的迷思，進入到壓迫人的中西文化、政治與社會體制的批判，展現存在主義的個人意志與抗爭精神；這兩部小說也是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品。

許多評論家從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離散美學的角度解讀過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²⁸，此書所富涵的內容意義、形式技巧與跨國移徙的多重文化糾結是其贏得關注的主因。整部小說以女性離散者桑青為主角勾勒出她的逃亡經歷：從抗日戰爭末期逃家擱淺在瞿塘峽、到北平共黨圍城之際的投奔夫家、再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被困閣樓、最後逃到美國，展開被移民局官員四處追捕的流浪生涯。桑青在美國逃亡的過程中精神分裂為桃紅，不斷宣稱桑青已死，與多位男子發生關係並懷孕，放浪的行為與傳統的桑青大相逕庭。白先勇曾從國族的觀點指出桑青的瘋狂暗示著近代中國政治上的精神分裂，桑青的流浪代表了中國人無家可歸的悲慘命運²⁹。但若從女性主義和離散文化的角度來看，桑青的逃亡卻正好產生完全相反的積極意義：桑青的兩次出走，第一次從父權結構下重男輕女的家庭出走、第二次從被夫所累困於台北閣樓的險境中出走，都是女性擺脫父權桎梏、追求自由解放的積極手段³⁰。桑青到美國後變成了桃紅，表面看是精神分裂，實際上未嘗不可視為是桑青的改變與成長，就如聶華苓所說，桑青是長在中國土地上的桑葉，象徵傳統文化，而桃紅鮮豔奔放，象徵的是併發的生命力³¹，它們同時存在於桑青的身上。小說中桑青變為桃紅時曾有一段自白：

你死了！桑青！我就活了。我一直活著的。只是現在我有了獨立的生活。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我和你完全不同。我們只是借住在一個身子裡（多麼不

²⁸ 可以參考馮品佳〈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中對眾家評論的引述，《中外文學》第34卷第4期，2005年9月。

²⁹ 白先勇〈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說的放逐主題〉，收入《第六隻手指》。

³⁰ 如范銘如〈來來來，去去去：六、七〇年代海外女性小說〉所說的，「桑青的逃亡史，正是與家庭離合的關係。從她第一次曉家逃到重慶開始，每當離家，她才享有自由解放；每當她試圖定居，從北京到台北，她就感受挫敗與恐懼。」收入《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頁143。

³¹ 廖玉蕙採訪〈聶華苓：逃與困〉，收入《打開作家的瓶中稿——再訪捕蝶人》，（台北：九歌，2004），頁53。

幸的事！)我們常常是作對的。即令我們做同樣的事,我們的想法是不同的。譬如肚子裡的孩子,你要保留孩子,因為你要贖罪;我要保留孩子,因為我要保留一個新生命。…我和你互相迫害,就和這個世界上兩大超級強國一樣,有時你佔優勢,有時我佔優勢。我佔優勢的時候就可以強迫你做你不願意做的事,譬如太空人登陸月球那晚你對江一波的挑逗和折磨,在鬼鎮墓園裡你對小鄧的放蕩。事後你就覺得罪孽深重——我就喜歡那樣子和你搗亂。因為你限制了我的自由。現在,你死了,希望你不要復活了,我就完全自由了!³²

桑青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中保守和壓抑的一面,桃紅則代表打破傳統束縛的主體自由。也可以說桑青代表的是過去的、中國與台灣不堪回首的國族/家族記憶,桃紅代表的是現在的、在美國流浪但自由/獨立的生活。如果將桑青視為中國身分認同,那麼桑青已死就意味著中國認同的解消,離散主體回復到單純的生命本身,以人的生存處境來觀察中國和美國社會的欠缺之處,桃紅在牆上的塗鴉,就是她對中國國共分裂的政治和美國的高科技社會的批判:

誰怕蔣介石/誰怕毛澤東/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桑青弑父
弑母弑夫殺女/…柯寧斯無線電工廠/警告牌/小心安全第一/超過此處必須
戴眼罩/不要跑不要隨便動手/急診處/工作遊樂無論何處無論何時安全第一
/電動鏡子電動梳子電動牙刷電動/腦電動人電動風電動太陽電動/月亮電動
接吻電動性交電動上帝/電動聖母電動電動電動電動/電動生殖器³³

桃紅以女性離散主體的姿態,宣告她厭棄兩岸的政治鬥爭與強人統治,並試圖推翻父權框架,逃離國族與父(夫)族的壓迫宰制;到了美國亦與先進的高科技社會保持距離,諷刺電動設備控制了人們所處的環境和日常生活起居,人與自然愈來愈疏離。桃紅在美國漫遊的路上,結識了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畸零人和離散族群,彼此有著共同的反戰理念和相似的國族破碎背景,見證著二十世紀漂泊離散的歷史,不獨中國人遭此劫難,因而使小說反映的離散文化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意義。《桑青與桃紅》不執著於中國認同,也不執著於生根成家的傳統觀念,相反的,當國族/家族成為迫害和控制個體自由的元兇時,逃離反而是最佳的解脫;逃離也是一種不斷與生存環境抗爭、尋求嶄新契機的方式,而展現了存在主義式的自由選擇與抗爭意義³⁴。因此桃紅說:「我到哪兒都是個外鄉人。但我很快活。」³⁵做為外鄉人可以讓她免於國族身分的羈絆,在美國四處流浪的行

³²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 (台北:漢藝色研, 1988), 頁 299-300。

³³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 頁 3-4。

³⁴ 林翠真也有類似的看法, 她認為《桑青與桃紅》超越了離散與文化認同的問題, 推進到「離散與人的存在」的辯證。見林翠真〈女性主義的離散美學閱讀: 以《桑青與桃紅》為例〉, 收入李瑞騰主編《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南:文化保存籌備處, 2003)。

³⁵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 頁 7。

程中創造新的認同³⁶，建立批判性的離散文化。

馬森的《夜遊》則是一部探討中西文化和社會問題的思想論辯型小說，透過女主角汪佩琳在加拿大婚變後的遭遇來反省人類生存的意義。汪佩琳從台灣到加拿大留學，嫁給英國籍知名生物學教授詹，婚後她發現詹汲汲追求世俗的成功，把她當成附屬品，爲了擺脫空洞的婚姻，她決定出走並和詹離婚。她的決定引起親人的反對，也促使她進一步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以及自己的異國婚姻和中國身分的關係。汪佩琳當初嫁給詹是想藉由他的英國身分融入加拿大社會，但當詹說出「瓊（汪的英文名）雖然是中國人，可是她的態度儀表卻像是英國人」時，她卻深感抗拒，驚覺到自己仍然是深愛自己的種族與文化的中國人，而活在兩個社會與兩種文化的夾縫和矛盾裡。

然而婚變的事實，給了她一個重新反省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機會，她發現她的人生一直受傳統價值觀左右，出國、唸學位、結婚，卻沒有自主性，在好友朱娣的引領下，她投入溫哥華的地下酒吧，之後認識了一群身處社會邊緣的雙性戀朋友，如麥珂等人，他們對性的開放態度和複雜的性傾向，以及沒有工作、沒有目標的生活方式，都衝擊著汪佩琳固有的傳統價值觀。她開始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對女性性欲的壓制：

傳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不管它多麼破敗荒謬，它仍然控制著絕大多數人的腦筋與行為，何況中國的傳統本有其偉大的一面。不過中國文化的末流好像愈來愈不重視人的感覺世界，尤其不承認女人也是個應該有感覺的動物。女人在中國男人眼裡，一概都應是烈女節婦；烈女節婦就是不能有肉體生活一面的那種人。……我也是受了中國傳統文化薰陶長大的，我對性也懷著一種不能自己的恐懼與污穢的感覺。但另一方面，我自然無法壓制或驅逐性的自然衝動，因此我便無法得到西方人那種比較純然地對性的享受，就像中國人坦然地享受美食的那種心情。³⁷

正視自身性欲而不將之罪惡化，是汪佩琳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一步。當她聽到麥珂說中國人神秘深刻不願表露內心時，又檢討了造成這種民族性的文化黑暗面：「我們中國人並不是故意地不表露自己，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壓力太大了，從小就養成了一種抑制自己的習慣。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群馴服的綿羊；鞭子下來，就朝前走幾步，鞭子不來，就各自低著頭吃自己腳下的那幾根草。」³⁸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壓抑了個人的感受，使人被動服從，不敢表露自己真實的想法，也不敢放手去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所以汪佩琳吶喊：「我只是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只是要做一個自由人！」

她和酗酒、不求上進、具同性戀傾向的麥珂交往，從他抗拒社會、文化和家庭壓力，追求無拘無束的自由生命的態度中，領悟到西方理性進步精神的缺點：

³⁶ 在馮品佳〈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一文中對此有詳盡論述，本文不贅述。

³⁷ 馬森《夜遊》，（台北：九歌，2004），頁119-120。

³⁸ 馬森《夜遊》，頁170。

什麼是上進？什麼是頹敗？難道說像詹那樣地斤斤於成敗得失，一心一意獲取成功的榮光的，就是上進的典型嗎？…他們忘了什麼是生活，他們也不知人與人之間到底應該有什麼關係。他們生活中只有一個目的：成功！…好像隱隱中肯定了人類只要毫不遲疑地朝前猛進，就必定是對的。…這就是西方的主導精神，把其他文化其他種族遠遠拋在後頭的精神！…為什麼人人必得終日營營苟苟處心積慮地掏光地球的資源，去創造可以取代人手人腦的機器？難道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摧毀地球？或捨棄地球？為了以機器代替人的一切？不但代替人工作，代替人思考，還要代替人生活嗎？西方人的最大野心，難道說如不把人晉升到不再需要生活的上帝，就把人貶抑到不能再有生活的蟲豸的地步嗎？³⁹

當初汪佩琳嚮往西方這種理性進步精神而出國留學，現在她卻從麥珂和詹的頹敗／上進的兩種生活方式的對照中，發現到進步不一定就是成功，可能只是加速地球和人類的枯竭毀滅。她也改變了對無業遊民、酗酒者、同性戀等社會邊緣人物的看法，了解到約定俗成的道德標準和社會價值觀並不是唯一的真理，她開始懂得尊重差異和包容不同背景的人。

在一次和麥珂、道格、愛蓮妮等人一起吸大麻的經驗中，每個人都說出了自己所背負的文化社會壓力和家庭創傷，令她感到「我們都是同類的動物，我們誰也不比誰高尚，誰也不比誰低賤，都是同類的、可憐的、心中充滿了各種欲求的動物！」⁴⁰在這裡，身分認同沒有意義，不管是中國社會還是西方社會，都有壓抑個體自由的龐大力量存在，在中國是傳統文化的包袱，在西方是理性進步的文明觀。汪佩琳從身分認同的矛盾中超脫，回到人的存在與自由選擇的根本問題上，因此她說：「我要生活！我要感到自己的存在！我要經歷種種不同的經驗，來確定我並不是別人投擲的一個幻影，而確是活生生地像個人似的活過了。我不要變作一種理念的延伸，一種文化的反射，我要野性地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活著。」⁴¹《夜遊》透過女性的邊緣位置從婚姻中解放，再進一步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觀念對個人主體的禁錮傷害，使離散主體屏除身分認同的困惑，認識到中西文化的本質與束縛人性的一面，進而體會到生存的意義和個人意志的重要，創造出具有存在主義精神的批判性離散文化與認同。

三、 結論

海外文學是六〇年代以降的台灣知識份子特定的時代環境下出國留學和移民所創作的作品。由於身處異國文化的環境，心中又懷抱著無法割捨的祖國想

³⁹馬森《夜遊》，頁 194。

⁴⁰馬森《夜遊》，頁 222。

⁴¹馬森《夜遊》，頁 375。

像與情感，海外文學常出現擺盪在祖國和居留國兩種文化之間難以調適的困惑，而產生了身分認同的迷惘，形成無根與放逐的「流浪的中國人」的創作主題，這一代知識份子也成為「無根的一代」，在異國放逐不歸；身分的追尋與認同迷惘的消解過程，是他們開啓的離散書寫中最引人注目的經歷。

檢視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的海外文學創作，發現小說中的離散主體試圖以各種途徑消解認同迷惘的困境，以便尋找身分的定位。其中的途徑有四：早期的離散書寫中，離散主體執著於中國身分，與異國社會格格不入，在既回不了中國大陸、又不認同台灣的痛苦狀態下產生死亡幻想、發瘋或自我放縱的行為，或暫將中國的理想精神內化於自身，以「我即中國」來消除身分認同的迷惘；另一種方式則以淡化和拋棄中國身分為解脫之道，通常以華裔第二代居多，但這當然又會形成另外的問題。

回歸祖國是鄉愁難遣的離散主體解決身分認同迷惘的又一途徑。彼時大陸和台灣都在中國身分的統攝之下，差別只在政治路線的左和右之分。不論回歸大陸或台灣，竟都使離散主體由希望而生幻滅，最後再回到異國定居，不啻是對兩岸政治現實最大的嘲諷。保釣運動曾激起海外人士對中國身分的認同以及對台灣土地的熱愛，引發回歸的希望，也帶動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發展，但人才的回歸卻受限於國內市場的需要，所學冷門便無用武之地。文革造成回歸大陸的人士報國無門，在荒謬的政治鬥爭中身死或受盡折辱。回歸的幻滅使離散主體對中國身分從認同的執著轉向了批判，在異國安身立命，不再對祖國懷抱虛幻的熱情。

第四種消解身分認同迷惘的途徑是回到人的存在本質。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只要其國族、家庭、文化觀念或社會制度對個人造成壓迫和傷害時，個人便有權逃離這些來自政治、文化和社會力量的桎梏，用個人自由意志去追求獨立的生活。當中國和西方的離散族群與邊緣人在異國聚合時，身分認同已不重要，生存的意義和個人的抗爭意志才是最根本的。這種存在主義精神的代入，使離散主體得以在祖國和居留國之間保持觀察的距離，對中西社會與文化採取批判的角度，創造出具有存在主義精神的批判性離散文化與認同。

從以上身分認同追尋的過程中可發現，離散主體認同迷惘的消解，就是身分重新定位的契機，離散主體從早期漂泊離亂的時代受害者，漸漸轉變為中西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的批判者，由懷想祖國、回歸後的幻滅到不寄希望於祖國和居留國，在兩者間以客觀的角度建立存在主義式的批判性離散認同，從而創造離散主體的特殊價值性與批判性的離散文化，當是台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最大的意義所在。

參考書目

一、小說著作

-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台北：允晨，2003
白先勇《紐約客》，台北：爾雅，2007
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台北：皇冠，1981
保真《邢家大少》，台北：九歌，1984
馬森《夜遊》，台北：九歌，2004
張系國《昨日之怒》，台北：洪範，1979
叢甦《中國人》，台北：時報文化，1978
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台北：漢藝色研，1988

二、專書及期刊論文

-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Ien Ang 作，施以明譯〈不會說中國話：論散居族裔之身分認同與後現代之種族性〉，《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7 期，1992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台北：韋伯文化，2006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
林翠真〈女性主義的離散美學閱讀：以《桑青與桃紅》為例〉，收入李瑞騰主編《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文化保存籌備處，2003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台北：前衛，2006
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2001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
馮品佳〈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4 期，2005 年 9 月
蔡雅薰《從留學生到移民：台灣旅美作家之小說析論》，台北：萬卷樓，2001
簡政珍《放逐詩學：台灣放逐文學初探》，台北：聯合文學，2003
廖玉蕙《打開作家的瓶中稿——再訪捕蝶人》，台北：九歌，2004

The Diaspora Writing and Identity Search of Taiwan

Overseas Novels

—Case Study of 1960s to 1980s

Tzuoh-Jen Ho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Overseas literature is the works created by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ho studied abroad and immigrate to other countries under a special environment of times since 1960's. As a result of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a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un-parted feelings of motherland image and sentiment, overseas literature often appears unadaptable puzzled and swung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homeland and residence. It creates disorientation of identity and therefore produces the theme of un-rooted and exile "wondering Chinese". The intellectuals became an "un-rooted generation" to exile in a foreign land; their counteract process in searching for identity and identifying with the disorientation is the most noticeable part in the diaspora writing they pioneer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observe the diaspora writings of overseas literature (mostly novels) from 1960s to 1980s and how they solve the dilemma of identifying with perplexity so as to unfol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When the diaspora subject identifies with the disorientation counteraction, it is the moment to re-position the identity. During this process, we discover that the diaspora subject transforms gradually from a drifting and confused victim in early times to a critic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 Starting from the yearning for homeland, the disillusion after return and then the hopelessness towards motherland and the foreign land, the subject establishes a existentialist-style critical diaspora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and therefore, this creates a special value of diaspora subject and a critical diaspora culture, which become the most significant meaning among diaspora writings of overseas novels.

Keywords: Diaspora, Exile, Identity, Existentialism, Overseas novel